

评论

代表提意见不是“自娱自乐”

奚旭初

有此意见的代表大有人在。就在昨天上海代表团分组审议时，林荫茂等代表就提出，政府部门应派人到现场听会，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，认真听取代表的审议意见，不能让代表提意见变成“自娱自乐”的呼吁，极具实际意义。代表铁肩担责任，发议论谏言，抒真知灼见，“好声音”响彻人民大会堂。代表中，有很多相关领域专业人士，他们在一些热点话题、社会现象上有着很大发言权。而这些代表人民群众的呼声、意见会不会得到重视，问题会不会解决，其重要标志是政府职能部门是否能够倾听，及时予以回应，因此政府部门理应贴近两会，与代表进行互动。

不少议论热烈的焦点问题，无论是代表还是媒体、公众都想及时知道政府部门的意见，但一些职能部门缺少了主动、及时回应，代表“好声音”基本

都以议案等形式留到会后办理。代表希望政府部门到现场听会，双方有面对面的交流沟通。互动中代表问的是热点、难点问题，体现的是代表对政府部门的监督，本质就是公众对公共权力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监督管理。另一方面，互动不仅是一事一问，一问一答，就事论事；其更大的意义，是通过质询与答复，不仅可以更好地倾听民声、反映民意、集中民智，而且对于加强监督，促进政府部门依法行政，都是有利的推进。

在加强代表委员与政府部门互动这件事情上，一些地方已有很多探索和经验。在地方两会上，不论人代会还是政协会议，都有各委办局在现场“摆摊”，代表委员可以就专门的话题，与政府部门坐在一起，直面审议。期待国家各部委都到两会现场“摆摊”，这必是民主政治的又一动人风景。

3月9日审议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时候，全国人大代表、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子龙提出意见：“我是老代表了，可每次审议政府工作报告，审查预算报告，都看不到具体职能部门的人。”谢子龙说，感觉某种程度上人大代表是在自娱自乐。(3月10日《中国青年报》)

微评论

央企高管不能只谈收入不讲贡献

王震

中石化茂名石油化工公司总经理余夕志说，“我们是中国第一大、世界第五大，但是老板的工资只80多万元。吓到了吧？”他认为“社会上普遍认为石油行业收入高，是由信息不对称造成的。”(3月10日《新快报》)

中石化老板年薪80万，无论在民企还是央企，确实都不算高，平安公司总经理年薪2007年就已达6616万元了。不过，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軾指出的那样，国企的利润很高，是因为它很多税不交、能够得到低于市场价格的贷款、能够免费使用公共资源、或者低效的使用，也就是说，大部分央企赚钱，不见得是掌舵人经营能力强，而是“共和国长子”这个身份占尽了便宜。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，80万的年薪是不是已经很高了？正如人们所质疑的，目前央企最大的问题，是只顾拿高薪，而忘了自己的出处。央企利润大，交税少，交给国家的利润就更少，有时反而还需要财政来补贴。这种不符合市场精神的情况，是一定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，以央企高管高收入为代表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，必然要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手术刀，以逐渐缩小贫富差距。

时事乱炖

@新华视点：【一位厅级干部的会海人生】去年一年1068个会，还不包括自己单位内部召集的。当沿海某省厅级机关一把手把这个数字公布时，当地省委书记都很吃惊。(3月10日《新民晚报》)

一年1068个会有多少是白开的

钱凤伟

毋庸置疑，一年1068个会，多半就是这样的形式大于内容。换言之，这样的会议，不过是空耗时间和精力，乃至不菲的会议经费，而效果其实是开了也白开。不仅如此，这样的会议，还有可能延误工作，助长不实之风，乃至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。

由于会议的泛滥已是积重难返，现在许多地方出台硬性的规定，比如设立“无会周”甚至“无会月”，以精简会议。一大批会议因此被砍掉，而能够被砍掉的会议，当然肯定是可开可不开的会，这也足以证明，以前的许多会议，都是白开的。

事实上，如此硬性地精简会议，让官员对剩下的会议加倍珍惜，因此自觉地挤掉其中的套话、空话、废话，开成精干、有质量的会议。而许多为会议所困的干部也因此腾出了时间，有利于到基层、到一线去抓工作的落实，去解决具体问题。



“转场” 王恒/漫画

时评

3月9日下午，全国人大代表、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在驻地接受了中国网记者的采访，谈及80后北漂者该如何做出人生选择时，他表示，北漂者应该回到家乡去，在家乡更容易受到尊重。(3月10日中国网)

80后北漂者的青春谁做主？

钱兆成

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说出一些带有主观色彩的话语的现象并不少见，一是满足成功人士自身的心理需求；二是成功人士有更为充分的话语权，说出口来掷地有声，的确能够影响一些人的价值取向。

不过正如一个硬币有着不同的两面，有一种偏向性的声音，自然还会有另一种不同的声音。宗庆后论断的立足点是“尊重”二字，然而笔者同样可以就“尊重”二字展开分析，以权之矛攻其之盾。

首先，北漂者未必真的喜欢在北京漂着，80后回家乡去，也未必会受到尊重，相反的，长久以来我们心中都有一种“攀高枝”心态。同样一份保安工作，如果在省城或者首都政府部门干，也比在县城工作更易受到尊重。这些80后父母们也不会详细提起自己儿女的真实处境，只是似是而非地提到某某部门的名称，羡慕的眼光早已经聚拢过来。我们可以指责这是一种不理智的心态，但事实总是如此，不容许你做过多辩解和分析。相反的，一个人早早地在二三线城市定居，从小看着“他”长大的人们未必会尊重他们。

另外，抛开世俗的观念，受人尊重是不应该分地域的，敬人者人才敬之，你敬我一尺，我敬你一丈，这

样的道理从表面上看是如此的顺理成章。消除地域观念后，我们会发现鱼儿有遨游水中的自由，也会有鲤鱼跳龙门的那一刻，有比较才会有选择。

从生活成本角度出发，小地方的生活成本是比较低，但小地方生活比较单调，远没有大城市丰富多彩。小地方的工作选择也难以有大城市那般丰富，有时候在小地方的心累也可能超过大城市的身累。有了大城市生活经历，重新回到二、三线城市的“都市人”，感觉又跳进了一个“围城”。

年轻人“逃回北上广”是一种人生围城的无奈。在一线城市，人们尽管背负着经济压力，却能满足一种无法替代的精神需求。这不仅仅在于大城市拥有更多的文化基础设施，也在于大城市充满机会并且有着相对的公平，能够承载更多人的精神追求。人们在这里可以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人，以免沉陷精神荒漠。

当然，现实问题依然存在，房价依然很高、生活成本依然很大，而每一个人都会权衡自身的利弊得失，以作出对自身最为有利的选择。由此，北漂更多的是一种心态，尊重别人的选择才是对他人最大的尊重。

“前腐后继”胆量缘于“飞机失事率”？

宜人

假如要评选“前腐后继”的典型案例，河南省交通厅定会榜上有名。

1997年10月，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曾锦城，因受贿罪被判刑15年。不到4年，2001年3月，曾锦城的继任者张昆桐又因受贿罪被判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2006年8月，这个省第三任交通厅厅长石亮亮因犯受贿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2011年12月，河南省检察院对第四任交通厅厅长董永安立案侦查。董被指控其利用职务便利，非法收受他人现金1631万元人民币及其他财物，涉嫌受贿罪。

按理说，在同一个部门里，前任翻车，后任自会本能地格外小心，不太会重蹈覆辙。谁知先后主管交通的这些厅长们，居然如此不遵守“交通规则”，连续出现“交通事故”，而且一个比一个跌得更惨，一个比一个更贪！

四任交通厅厅长为何会“前腐后继”？有一个“坐飞机理论”或许能够说明一些问题。人们都很清楚，坐飞机有一定危险，全世界每年都有一两架飞机掉下来，而飞机失事，乘客幸存的几率很小。那么为什么许多人还是要选择坐飞机呢？这是因为飞机失事率很低，遭遇一次飞机失事的概率是几千万分之一。同样，如果因为贪腐被抓的几率跟坐飞机的失事率差不多，那么官员们就会心存侥幸，总觉得不会轮到自己头上。据说在香港，如果你想贪污的话，保证有60%的机会抓到你，看你敢不敢贪！反腐败，就是要想办法让公职人员不想贪，不能贪，不敢贪，其中关键就是要不敢贪，贪了就会被捉，身败名裂，得不偿失。

非常道

她像个骄傲的女学生，背着心爱的作文，这篇作文触碰的是极严肃的主题，这产生了化学反应，勾兑得大家又轻松又过瘾，也发人深省。

3月8日上午9时，全国政协委员、民建中央调研部部长蔡玲脱稿发言《如何避免“八项规定”一阵风》，不到1000字收获了13次掌声。白岩松在微博上评价。

“一般领导来开会都是司机把车停在门口，领导开完会直接坐车离开。在叶青看来，这体现的是当下的官场文化。”

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曾被安排到省政府去讲课，由于叶青未开车而是骑着自行车，警卫将其拦在大门外。